

目 录

卷首语

- 现代出版的内涵
- 责任编辑是什么
- 地方出版社要注意地方特色
- 我心目中的静山
- 我看畅销书
- 清江飞出的歌
- 按需印刷 热点初现
- 无垢经: 中、韩学术论争的焦点
- 燃烧生命铸编魂
- 《美国出版社的组织和营销》序
- 中国图书如何走向世界
- 社会热点问题选题策划
- 什么是审读
- 编辑学研究深化的可喜成果
- 利用计算机编制字典页码的一次尝试
- 令人瞩目的《中国蒙古学文库》
- 试论编辑价值观
- 讲述展现人性至善与生命壮美的故事
- 亟须加强农村读物的出版和发行
- 全国第三届出版科研优秀论文奖评奖揭晓
- 1937~1949年的香港出版业(下)
- 韩国学者闵丙德先生
- 也谈审读
- 面对21世纪 我们瞄准哪里
- 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是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

◆ 各期杂志

- 2000: 第3期 第4期
- 2001: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 2002: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增刊
- 2003: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 2004: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 2005: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 2006: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

1937~1949年的香港出版业(下)

王仿子

第二次文化出版高潮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英国接管香港。中共中央电令广东区党委, 立即去香港、广州占领宣传阵地。原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杨奇, 奉命带领6名编辑、记者迅即奔赴香港, 经过短促的筹备, 香港战后第一张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正报》(四开, 三日刊)于1945年11月13日创刊。社长杨奇(化名杨子清)兼任总编辑。后由黄文俞接任, 改为周刊。与此同时, 中共中央南方局派章汉夫、乔冠华、龚澎、廖沫沙、林默涵、邵荃麟、范剑涯等赴港, 会同广东区党委派出的饶彰风、杨奇等在香港重建面向港澳以及南洋各地的传播据点。经过三个月的筹备, 1946年1月4日《华商报》复刊, 日出一大张。又建立附属机构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务公司, 萨空了任《华商报》总经理, 刘思慕任总编辑, 邵宗汉、廖沫沙、杜埃任副总编辑。在总经理之下, 任命陈东为报社经理, 邓楚白任出版社经理(不久从广州兄弟图书公司调来吴仲接任), 印务公司经理为邓重行。

在1941年, 大批文化人从大后方撤至香港后, 香港出现过一文化出版高潮。经过日军占领, 进步的革命的出版机构全部撤走, 当地工商界办的报纸亦有不少停刊, 使香港变成一片文化沙漠。香港的人口从150万降至50万。日本投降后, 《华商报》的复刊, 以及《星岛日报》、《星岛晚报》、《工商日报》、《成报》等先后复刊, 1947年5月, 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查禁, 徐铸成把《文汇报》迁到香港出版, 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复刊, 使香港的报业又出现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

新民主出版社是香港在战后出现的第一家出版社。《华商报》成立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从上海拨来一笔经费, 其中一部分是由夏衍经办的二十大木箱的书(生活书店等出版的书籍), 运到香港后成为新民主出版社经营出版业务的资金。新民主出版社把翻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著作作为首要出版任务。如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等。在总编辑廖沫沙的领导策划下, 曾有计划地出版一套毛泽东著作, 用统一的开本格式, 实际上是一套用单行本形式组成的《毛泽东选集》。从1946年初到1949年夏, 先后出版的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等19篇重要著作。又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依据延安解放社的本子, 重新排版, 出版香港版的《整风文献》。

刘邓大军渡过黄河之后, 香港通过大连、烟台等港口与东北、华北解放区得以沟通, 新民主出版社经由东北书店和华东新华书店获得解放区的出版物, 在香港翻印出版的有叶蠖生的《中国革命读本》, 张如心的《毛泽东论》等, 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改革问题》、《美蒋阴谋秘闻》、《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蒋党真相》等等。还有一本小册子《从一个村看解放区的文化建设》, 是中共香港文委负责人邵荃麟交给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出版社还编了一套以培养革命人生观、世界观为目的, 面对知识青年的启蒙读物《青年知识丛书》, 有曹伯韩著《怎样求得新知识》, 高天著《生活与理想》、《怎样交朋友》, 怀湘著《恋爱新观》, 吴费(洪道)著《读书的故

事》，华嘉著《学习的故事》，杜埃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人民文艺浅说》等等。黄谷柳的《虾球传》在《华商报》连载后，亦由新民主出版社出版。此书描写一个流浪的孩子的苦难经历，既富有地方色彩，又富有生活气息，是一本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新民主出版社在干诺道有一个门市部，既销售本版书，又经销生活书店等出版的外版书。1949年5月，上海解放，饶彰风向出版社负责人吴仲布置，一俟广州解放，即由新民主出版社负责在广州建立新华书店。新民主出版社接受这项任务后，6月派殷劭携带十箱图书赴上海，在上海三联书店经理毕青和上海新华书店经理朱晓光的帮助下，又获得华东新华书店负责人叶籁士的支持，拿到了毛主席书写的新华书店四个大字的复制品和北京版《干部读物》、《人民文艺丛书》的纸型，以备华南新解放区的需要。10月14日广州解放，吴仲带领新民主同人到广州，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指示，建立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留在香港的新民主出版社利用香港的印刷力和纸张，大量印制毛主席像、朱总司令像、毛主席著作、《干部读物》，以及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提供给华南新华书店供应新解放区的广大读者。

生活书店再次到香港建立据点是1946年初夏。当时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已彻底暴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动组织十万人于6月23日走上街头，举行反内战大游行。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预感到一场人民与反人民的战争将不可避免，作为应变措施之一，他派遣张明西、王仿子到香港建立一个出版发行据点，一方面向港澳地区和南洋各地读者输送进步的革命的书刊，另一方面储存一部分纸型，做一点出版工作，一旦上海不能立足时有一个保存力量继续奋斗的基地。

张明西、王仿子于1946年7月初到达香港。经过日本占领军野蛮劫掠后的各行各业正在逐渐复苏，文化生活亦逐步恢复，香港人口从被占领期的50万逐渐恢复到70万、80万……在繁华的商业区中环有大公书店、智源书店等几家原本经销学生用书、儿童读物以及消闲娱乐性图书的小书店，以后又有学生书店和前进书店愿意经销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商务、中华、世界、大东、百新等书店已经恢复营业，与以往一样，对于生活书店的出版物还是敬而远之。国民党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在香港没有分支机构，仅在干诺道一家货栈的阁楼上有一家代销店，只做批发，不设门市。

1947年6月20日，生活书店在皇后大道中54号2楼的门市部开业，继承30年代上海生活书店门市部的传统，按图书分类法陈列图书，全部开架销售。除本版书外，又经销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开明书店、文化生活社、光明书局、群益出版社等新出版业的书刊，尽量做到应有尽有，经常保持三千个品种。在门市正中墙上悬挂由装帧艺术家曹辛之画的邹韬奋先生的大幅油画像。曹辛之在重庆《全民抗战》编辑部工作时，与韬奋先生朝夕相处，这一次用他神来之笔，勾画出韬奋的精神面貌，使生活书店的老读者一进门就倍感亲切。在随书赠送的书目上，印上体现生活书店宗旨的口号：“促进大众文化，发展服务精神。”新开业的生活书店门市部，力求做到使每一个上门的读者感受到书香气氛。

生活书店在香港造货是从1946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主要是重印上海出版的书，到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事业加强压迫摧残，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被迫离开上海迁到香港，由胡绳、史枚主持的编辑部随之迁到香港，又增聘茅盾、邵荃麟担任一部分编辑工作，这一时期开始在香港发稿，交给由杜宣创办的大千印刷厂和嘉华印务公司承印。出版的新书计有：《韬奋文录》，《方生未死之间》（乔冠华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著），《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著），《近代世界政治史》（钱亦石著），《世界政治手册》（陈原著），《中国通货膨胀论》（杨培新著），《辛亥革命回忆录》（张奚若、丕强著），《美国人的性格》（费孝通著）等；属于《新中国大学丛书》的有：李达著《新社会学大纲》，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著《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周谷城著《中西史学之比较》，王亚南著《中国经济原论》等；续出的《青年自学丛书》有：杜守素著《先秦诸子思想》，狄超白著《中国土地问题讲话》，彭迪先著《新货币学讲话》，孙起孟著《学习·工作·修养》，戈宝权著《苏联文学讲话》，周建人著《生物进化浅说》等；文艺作品有《马凡陀山歌》（续集），郑君里著《角色的诞生》，高尔基的《奥莱叔华》、《旁观者》，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阿德》，拉夫纪由夫的《苏联女英雄》等。还有米丁著《历史唯物论》，狄芝根著《辩证法的逻辑》，《论新民主革命》（东南欧新民主六国代表在华沙会议的报告）等等；重印书有：韬奋著《抗战以来》，

杨明(胡耐秋)著《韬奋先生的流亡生活》，以及《青年自学丛书》中的一些畅销书、常销书，如《思想方法论》、《新人生观讲话》、《创作的准备》等等。

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推翻蒋家王朝，争取全国解放的战争形势已十分明朗，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昕这个时候思考的是生活书店用什么样的具体行动迎接全面胜利。他在1948年4月10日出版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复刊号上发表的《认清目标，努力准备》一文，可说是一份生活书店迎接人民胜利的工作大纲。他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在这大时代的大变革中，认清目标，担负起责任时，对于健全组织，计划出版，培养干部，增厚财力，发展业务一一加以论述，提出努力方向，力求“配合新时代的需要来加强准备一切”。对于出书方针，他指出继续贯彻韬奋生前制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最大多数的同胞在文化水准方面能够逐渐提高与普及”，“我们所努力的是为大众谋福利的文化，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福利的文化”的方针。他认为：“从现有条件出发，从城市职业青年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启蒙及再教育工作出发，自今以后，我们特别应当努力贡献出完全适合于工农的读物，并保证这种读物能够达到工农的手里。”从1948年开始编辑出版的《新中国百科小丛书》就是贯彻这个出版方针的产物。

《新中国百科小丛书》每册二万三字，42开，老五号字直排，定价低廉，是一套为工农干部准备的启蒙读物。在计划中已列出选题100多个，到1949年初，编辑人员离港北上为止，已出版30多种。有《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洪秀全》、《蔡特金》、《美国》、《群岛之国——印尼》、《怎样搞通思想方法》、《怎样做调查研究》、《价值与剩余价值》、《导演与演员》、《DDT》等等，是一套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国外国内无所不包的初级读物。

在1948年，由中共香港文委发起，生活书店还出版了一套《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主编，主要撰稿人有冯乃超、胡绳、林默涵、乔冠华、周而复等。每两个月出版一期。名为丛刊，实际上是一本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杂志。因为当年港英政府华民司署规定，出版一份定期刊物必须有一名香港的头面人物作督印人，还要缴纳3000元保证金，用丛刊形式出版，可以免去这个麻烦。

《大众文艺丛刊》每期都有几篇文艺理论文章，还有几篇解放区的小说、诗歌等。既然是丛刊，每一期要换一个刊名。第一期的名称是《文艺的新方向》。这里指的“新方向”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的文艺为工农兵的新方向。第二期是《人民与文艺》，以下依次为：《论文艺统一战线》、《论批评》、《论主观主义》、《新形势与文艺》。每一期的题目都与本期的主要论文的主题密切扣合。从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出版6期。这6期的内容环绕一个主题。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以及其他被认为违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作品和作家(如沈从文、朱光潜、肖乾等)。

与生活书店同一时期到香港来开展业务的还有桂林的文化供应社。抗战时期桂林是著名的文化城，进步的出版业曾经依托桂林的特殊条件出版了许多著名的杂志和书籍。经过日军的占领后，文化城已是一片瓦砾，百业凋零，桂系白崇禧向南京政府靠拢，加入国民党的反共大合唱，压迫进步文化事业，逼使文化供应社的代总经理赵晓恩携带一批纸型于1946年夏季到达香港，另谋发展。

文化供应社邀请王任叔、宋云彬担任编辑工作，在港新出版的书有：胡仲持翻译的《文艺鉴赏论》，胡愈之著《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胡愈之用笔名沙平发表的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又增订重编《初中精读文选》等。

经胡愈之介绍，文化供应社曾协助新加坡爱国华侨陈岳书、王叔 创办的上海书局编辑一套适合南洋侨胞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陈岳书、王叔 不满意当地奴化教育的教科书，所以要邀请在港文化教育界人士另编一套现代中小学教科书。通过文化供应社约请宋云彬、孙起孟任主编，编委有蒋仲仁、秦似、傅彬然、王健、廖冰兄等，按国语、常识、算术、自然、公民、历史、地理等分门别类编写，又聘请叶圣陶负责校订。小学教科书出版后，因课文讲到鸦片战争的历史事件，被新加坡、马来西亚当局查禁。经过疏通并作适当修改后，才允许发行。接着又编辑现代中学教科书数十册。

1946年6月，杨奇奉领导华南党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方方之命在香港筹备建立中国出版社。杨奇任主编，李克平任经理。由周恩来提请毛主席书写社名的中国出版社，1938年

成立于武汉，当年并无实体，只是一块招牌，由新知书店承办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在汉口、重庆用这块招牌出版过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生活书店在重庆也用这招牌出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杨奇主持的中国出版社设在皇后大道中洛兴行的二楼，出版的书籍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丛书》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著作，还有介绍解放区建设的书籍，如《解放区的生产运动》、《解放区的土地政策》、《关于工商业政策》、《土地改革与整党典型经验》等等，还有《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陈伯达著)、《苏联纪行》(郭沫若著)等。又用海洋书屋的名义编印《北方文丛》，收有《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解放区作家的文艺作品。1947年2月，杨奇调去协助乔冠华筹建新华社香港分社时，由周而复接着主编《北方文丛》，继续出版《荷花淀》、《高原短曲》等书。

1948年10月，由郭沫若创办的群益出版社的负责人冯乃超电召吉少甫到香港，建立群益出版社香港分社，并委托周而复主持群益出版社的工作，由吉少甫主持出版业务，运用群益出版社的资金，继续用海洋书屋的招牌出版《北方文丛》，计有《白毛女》、《三打祝家庄》、《刘巧团圆》、《同志，你走错了路》等十多种。还出版了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

中共地下党员彭枫、司徒坚接受党的指示，1946年5月在弥敦道开办南国书店。在当时是九龙第一家经销进步书刊的书店。1947年底，中共香港工委派卢苇出任书店经理之后，扩充业务，担任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机关刊物《光明报》的总发行，进一步发挥附设机构进修图书馆、生活油印社的作用，通过借阅进步书刊，举办读书会，组织郊游等活动，联系群众，引导青年走向革命。1948年秋开始编辑出版《南国文艺小丛书》，收有黄谷柳的《墙》，紫风的《学士帽子》，许稚人的《奔流》，陈帆的《泪是这样流的》，胡明树的《江文清的口袋》等。单行本有秦牧的《贱货》，黄秋耘的《浮沉》，纪录昆明学生运动的《“一二·一”的回忆》，为迎接全国解放特地编写的《进入新社会之前》(黄雨著)等。还有在胡志明领导下亲身经历越南革命斗争的归国华侨曾平提供的《战斗的越南》和《八月革命》。

抗战结束，新知书店迁回上海后，于1946年底派唐泽霖到港建立南洋书店。出版的新书有：许涤新著《官僚资本主义》，宋云彬著《中国近百年史》；翻印解放区出版物有：柯蓝著《红旗呼啦啦飘》，陈祖武(李立)著《四十八天》，赵树理著《李家庄的变迁》等。书籍印成后交生活书店发行。

在1947~1949年初这段时间里，唐泽霖在经营南洋书店之外，又接受中共华东局驻香港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徐雪寒(原新知书店总经理)的委托，以商人的面貌往来于香港、台湾、上海、天津、大连、安东、石岛之间，从解放区运出大豆等农产品，运进解放区紧缺物资。到1948年底，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黄洛峰、徐伯昕的安排，由万国钧、唐泽霖经手租用外轮，把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出版干部分批运到华东、华北解放区，或在朝鲜登陆，转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春，他与群益出版社负责人吉少甫两人按照中央香港文委的决定，携带一批新民主出版社的纸型，包括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潜回上海，准备在南京、上海解放后立即向广大读者供应毛泽东著作。

新知书店总经理沈静芷从上海抵达香港，张朝同从北平到港后，又用南海出版社名义出书，编入《社会科学小丛书》第一辑的有：狄超白著《战后中国农民问题》，巴人(王任叔)著《远东民族革命问题》，乔木、沙溪著《国际问题讲话》等；第二辑有：许涤新著《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并于1948年4月在湾仔轩里诗道开设新知书店香港分店门市部，沈钧儒、郭沫若、茅盾、邵荃麟、狄超白、马叙伦、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陈劭先、宋云彬等题词祝贺，盛极一时。

1947年下半年，由留港文化人黄宁婴、华嘉、黄新波、陈实、黄蒙田、杜埃、楼栖等发起组建的人间书屋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出版社。他们的做法是：凡在人间书屋出书的作者和译者，都得把稿费的一半留给人间书屋，作为股金，所以书屋的股东越来越多。广州解放后，书屋迁到广州，继续出书，到1952年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书屋在港穗先后出版的著译有《论方言文艺》(华嘉著)，《狮与龙》(林默涵著)，《论约瑟夫外套》(黄药眠著)，《天亮了》(聂绀弩著)，《民主短筒》(黄宁婴著)，《春寒》(夏衍著)，《造物者悲多芬》(陈实译)，《织工歌》(林林译)，《盐场上》(杜晦之译)，《斯大林的儿女们》

(杨嘉译)，《认识苏联》(杨奎章等著)，共数十种。

1947年，正报社在洪文开主持下开办正报出版社，曾出版《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等书籍。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爱国民士和大批文化人的来临，给香港带来种种新的文化设施，大大丰富了香港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除前面说到的《华商报》、新民主出版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南国书店等外，从1946年到1948年这段时期里在香港创办的还有由章汉夫主持的党的理论刊物《群众》(周刊)，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出版的《光明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人民报》，胡希明(笔名三流)主编的《周末报》，张铁生、黄秋耘主编的月刊《青年知识》，茅盾、巴人、周而复主持的《小说月刊》，司马文森、陈残云主编的《文艺生活》，秦似主编的《野草丛刊》，孙慎、联抗主编的《新音乐》，林涧青主编的《自由丛刊》，赵元浩、古念良先后主编的《经济导报》，黄庆云主编的《新儿童》等等。在1946年上半年，还出版过一本综合性杂志《愿望》周刊，由智源书店的陈建功创办，胡守敬、梁若尘先后任主编。龚澎主编，于1946年12月出版的《中国文摘》(半月刊)与刘尊棋、金仲华主办的《远东通讯》，是两份面向国际人士，报道解放战争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以及在解放区实施的经济文化政策的英文杂志。这支以外省人居多数的文化出版大军为香港掀起了有史以来第二个文化出版高潮。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五强”之一，港英当局对进步的文化出版业态度稍有改变，取消新闻检查，报纸上不再“开天窗”了，但英国殖民统治的本性不变，港英当局同国民党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报刊、书籍上出现某些字眼还是犯禁的，如“国民党匪军”、“蒋介石匪帮”，其中的“匪”字都得换成“(略一字)”，读者自然心里明白；如有触犯英国皇室之处更是不客气了。新民主出版社门市部就因为经销《马凡陀山歌》(续集)，负责人吴仲被警署政治部找去“谈话”，追查马凡陀是什么人，书是哪里出版的等。据说是因为其中一首诗对英国女皇有不恭之处，由于吴仲巧妙的应付，最后以没收门市部的存书了事。南国书店出版的《战斗的越南》、《八月革命》，因写有法帝国主义被禁止发行。

香港当时印刷厂不少，绝大多数是承印商业零件的小厂。如承印生活书店图书目录的德忌笠街的诚泰印刷厂，仅有一台对开机，两台圆盘机。有全张铅印机能承印书和杂志的有西环的嘉华印务有限公司的印厂，马宝道的大千印刷厂，《华商报》的有利印务公司等，排印装质量远远落在上海之后。设在香港的商务印刷厂和中华印刷厂，经过日军劫掠，损失惨重，到1947年逐渐恢复，因为有上海的技术工人，设备先进，印装质量在香港印刷业处于领先地位。生活书店在1948年出版《生活手册》，要求达到上海的印刷质量，最后由香港商务厂承印。广州解放时，商务厂和大千、嘉华、有利印务公司等，承印新民主出版社委印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另有永发印务公司承印彩色毛主席像和朱总司令像，供应华南新解放地区的急需。香港中华厂把主要印刷力量用于印制有价证券(钞票和邮票)，一般不接受外活。

1948年6月6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负责人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接到周恩来发自西柏坡、经香港工委章汉夫、再经胡绳转达的电报，要求：(一)“即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资本亦尽可能转来”；(二)“业务以出版通俗读物为主，向工、农、兵、学生、店员、贫民等介绍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及新文艺”；(三)“有计划编印或选印几套丛书”；(四)“为联系读者，在转移时应保留一部分可能留下的活动力量”；“有时可换门面以求生存”，对转移人员“必须告以解放区条件困难”，使他们“有精神准备”(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年第775、776页)。随即在中共香港文委领导下由胡绳、邵荃麟、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五人组成合并工作的筹备委员会，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到10月18日召开三家书店的股东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推举黄洛峰任管委会主席，徐伯昕任总经理，沈静芷任副总经理，万国钧、薛迪畅任助理。随后，三家书店的大批干部，包括编辑人员分批从香港、上海两地，由水陆两路开赴华北、东北、华中解放区。1949年3月，徐伯昕、胡耐秋、程浩飞等离开香港，从水路到天津登陆，转赴北平，在香港只留下皇后大道中的门市部作发行工作，改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招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

北平召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由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于10月3日在北京开幕。人民解放军于10月14日推进到广州市郊三元里，同日广州解放，《华商报》在15日刊出终刊词《暂别了，亲爱的读者！》后停刊。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从1948年冬季开始先后离港北上，或开赴新解放的广州，由他们于1946~1948年间创办的报纸、杂志纷纷停刊，一度繁荣发达的香港新出版业又一次骤然休止。香港出版业再一次的兴旺发达、日益繁荣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另一个历史时代了。

本文参考材料：

- 《香港报业春秋》 钟紫主编
- 《香港报业杂谈》 李家园著
- 《生活书店史稿》 李文、许觉民等编著
- 《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 本书编委会编
- 《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 汪家熔著
-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周年》 商务印书馆编
- 《回忆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编
- 《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 赵晓恩著
- 《懒寻旧梦录》 夏衍著
- 《香港文化脚印》 罗隼著
- 《忆抗战期间香港〈文艺青年〉半月刊》 杨奇著
- 《记香港新民主出版社》 吴仲著
- 《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 俞筱尧著
- 《战斗的集体——记香港南国书店》 卢苇、曾迪著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 (ID:52)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话：027 68753799 传真：68753799 E-mail：cbkx@163.com

技术支持：cgz@163.com

【您是第位访客】